

#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

## ——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沈凯俊<sup>1</sup>,尹思薇<sup>1</sup>,宋靛琚<sup>2\*</sup>

(1.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2.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200433)



**摘要**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关键词** 代际居住距离; 互联网使用; 老年生活质量;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4-0135-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3.04.01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当前,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亟需乡村振兴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希望通过积极建设县域,从而吸引年轻群体返乡,实现乡村振兴。该政策如何影响农村老年生活质量尚不清晰,需要论证子女在县域生活是否仍然能够维系农村老年父母的社会网络,保障其老年生活质量。费孝通先生当年针对传统农村社会提出的“差序格局”依然有助于理解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网络<sup>[1-2]</sup>,进而解释该政策对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只不过在传统农村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乃至生活质量都受限于居住距离。而在现代农村社会中,随着互联网等现代通讯设施的普及,原本受限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社会网络得以重构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呈现出“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家庭形态<sup>[3-4]</sup>。由于目前居住安排变迁同时伴随着现代科技和交通的进步,因此不能用传统标准界定现代的居住安排,这种变迁对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尚不清晰。尤其是考虑到代际矛盾和子女婚姻、事业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老年人和子女在同一屋檐下居住的生活质量不一定高,相对应的老年空巢也不一定与“凄凉”相伴<sup>[5]</sup>。

在乡村振兴县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农村家庭老年父母与子女居住距离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代际支持的平衡,以及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是如何打破农村传统代际居住距离的限制、维系社会网络甚至

收稿日期:2022-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加快养老服务体系研究”(20ZDA0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多状态模型研究”(20YJC840023)。

\*为通讯作者。

改善老年生活质量?上述问题的回答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县域层面开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此,提出以下两项研究问题:(1)我国农村目前何种代际居住距离使得老年人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对于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从家庭视角研究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和老年生活质量的关系,试图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1.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差序格局

社会网络架起了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之间的桥梁,农村老年人获得较高生活质量的前提是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sup>[6]</sup>。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生动概括了农村社会网络,即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头入水泛起的波纹,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sup>[2]</sup>。只不过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一般与自己亲属的交往最为密切,其次是朋友和邻里,最外层的圈子以陌生人为主,且这种关系极大程度上受到地缘因素影响<sup>[7]</sup>。但是在现代农村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交通的便利,居住距离变远没有大幅增加时间距离<sup>[8]</sup>。差序格局描述的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地缘因素的扁平化格局向脱离地缘因素的立体化格局发展。

差序格局的立体化发展,对当下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一方面,通讯与基础设施变革带来了人们关于县域内时空经验的变化,差序格局理论不再局限于居住距离。这使得子女即使前往县域发展,老年父母依然能够维系社会网络,从而获得较高的老年生活质量<sup>[9]</sup>。另一方面,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稳定需要付出大量经济、情感和照料支持,过远的居住距离势必会破坏社会网络的平衡,从而影响老年生活质量。因此,差序格局理论涵盖的适度居住距离概念将有效支撑乡村振兴政策,较好的诠释当下时代农村新面貌。

### 2. 老年生活质量测量

随着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国家战略,老年政策重心势必从关注养老模式转变为注重提升老年生活质量<sup>[10]</sup>。老年生活质量是指一定时期内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生活环境和情感慰藉的综合情况。

从老年生活质量概念来看,它是一个结构相对宏大而核心相对松弛的概念,其定义、指标体系和评价准则仍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关于老年生活质量的研究涉及现状调查描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sup>[11-14]</sup>。总的来说,研究都认同它是全面评价生活优劣并从社会发展结果来考察人口生活状况的一个指标<sup>[14-15]</sup>。

从老年生活质量测量来看,不同研究虽各有侧重,但指标设定整体上大同小异。测量维度一般至少包括健康和经济维度,测量方式一般既包括主观感受,也包括客观现实<sup>[16]</sup>。本文关注的是相对低生活质量的农村老年群体,相应的,老年生活质量会更侧重于健康和经济等基础性指标,而非社会参与等高阶指标。尤其在国內,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了“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强调健康老龄化是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因此,用健康老龄化框架衡量老年生活质量在中国有着更现实的意义,是目前农村老年群体切实可行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从健康老龄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健康老龄化与老年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国际上关于健康老龄化的定义和测量也已经从仅注重健康维度,转变为关注生活质量本身<sup>[17-20]</sup>。

本文借鉴WHO提出的“健康老龄化=内在能力+环境支持”的指标体系操作化定义老年生活质量。以内在能力和环境支持维度测量老年生活质量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老年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两个评价维度是健康和经济,前者主要代表了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后者主要代表了老年人的环境支持水平,这与健康老龄化的指标高度契合;第二,老年生活质量指标构建应该包含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两个方面,前者是个体对生活境况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观判断,后者是个体对生活境况的综合感知、评价和期望<sup>[15,21]</sup>,这也与健康老龄化的指标高度契合。

### 3. 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生活质量

在中国传统农村,受限于交通和科技因素,老年父母与子女分而不离,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资源,故而传统观念一直强调“父母在,不远游”<sup>[6]</sup>。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村出现了大量老年空巢家庭。在大众视角中,“空巢”一词比喻了家庭中子女不在身边而年迈的父母独自居住的现象,就像雏鸟长大振翅远飞而留下老鸟独守空巢,衬托出了空巢老人的“孤苦无依”<sup>[22]</sup>。

但是在中国现代农村,空巢不仅成了家庭收缩阶段的完成态,也是构成核心家庭发展趋势的特定组成部分,这已不是一种短期或临时的现象<sup>[23]</sup>。同时现代性逻辑所预言的亲子关系被夫妻关系所取代的未来家庭形态没有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出现,而是以网络家庭形式保障了生活质量<sup>[24]</sup>。一些早期研究已经发现与子女分开居住并非意味着代际支持弱化,例如有学者发现城市化虽然降低了老年人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机会,但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增强了老年生活质量<sup>[25]</sup>。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相对合适的代际居住距离既有利于维系代际的亲近关系,同时也有利于为两代人提供相对独立、隐私的生活空间,避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和矛盾冲突,成了双方共识下的主动为之<sup>[5,26]</sup>。

### 4. 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

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在老年人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初,互联网等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影响不大,这可能与当时农村手机普及率偏低有关<sup>[27]</sup>。但是随着时代进步与发展,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84亿。与此同时,网民中老年人的比例在提升,60岁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占网民整体的比例达11.5%,而2010年该比例仅为5.1%。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到21世纪中叶,互联网在老年人口中使用将十分普遍,保守估计比例有六成<sup>[28]</sup>。

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对于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关注,普遍认为互联网使用提高了老年生活质量。国外学者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从而降低孤独感,增进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sup>[29]</sup>。国内学者也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积极老龄化有显著正向作用<sup>[30]</sup>。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使用降低了沟通成本,为代际互动模式创造了新的条件。老年人能与相隔千里的亲人保持联系与沟通,修复和重构了家庭社会网络<sup>[31]</sup>。

代际居住距离增加也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创造了需求。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与子女分开居住使得老年人有更大概率使用互联网,从而方便与子女的联系<sup>[32]</sup>。但是互联网仍然无法弥补过远代际居住距离带来的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虽然互联网使得在外的子女能和老年父母及时沟通,但是过远的代际居住距离带来了文化社会方面的差异,造成两代人生活经验的割裂,不利于双方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交通时间和更高的交通成本,互联网带来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不足以替代照料支持<sup>[33-34]</sup>。

### 5. 研究假设

上述讨论表明,只有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才能理解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和老年生活质量的关系,以此回答子女在县域居住是否提高空巢父母生活质量的命题。相比于传统与子女同住,子女县域居住的优势源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自身主观原因,部分农村老年群体对于空巢的偏好。偏好空巢的老年群体往往认为养老资源不会因为代际居住距离较远而过分减弱,适度代际居住距离反倒使得两代人在相对独立中保持了一定的亲密性。第二,自身客观原因,自身禀赋的理性选择。老年群体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具备一定的临时性和灵活性。一般愿意保持独立居住的老年群体仅仅是因为老人自身还很年轻,也暂时没有抚育和养老的需求<sup>[35]</sup>。第三,外在客观原因,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以及交通设施的建设,有效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老年生活质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sub>1</sub>: 在当前农村,相比于子女在本户和本村居住,子女在本镇和本区居住的老年父母生活质量更高。

面对当前代际居住距离变远,而老年生活质量不降反升的现象,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可以作为其中一条解释路径。与子女保持适度居住距离的老年人既能获得更多的数字反哺机会,也有更高需求使用互联网。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sub>2</sub>:在当前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是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

图1曲线表示代际居住距离与父母老年生活质量的关系。使用互联网的老年群体代际居住距离从近至远,老年生活质量整体上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其中县域居住距离平衡了子女事业和养老资源,父母老年生活质量较高。而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群体更难获得子女的支持,老年生活质量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和老年生活质量的分析框架(图2),围绕互联网使用解释县域代际居住距离的优势。整体上表现为,子女居住在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较高。

## 二、数据、变量及分析方法

###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其调查对象为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这些地区占全国总人口95%以上,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老年人基本状况。总样本数量为11481,其中具备认知回答能力的农村老年人样本为4240人。在剔除不完全自理、无子女存活、无子女居住信息以及年龄60岁以下和100岁以上特征的样本,最终得到农村有子女的老年人有效样本观测值为3215人。其中,剔除不完全自理的样本是由于失能会影响子女代际居住距离,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自理能力使用Katz指数测量,根据进食、洗澡、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上厕所和床椅转移7项评定内容打分,按照由难到易顺序进行排列,分成完全自理至完全依赖7个等级,最后仅保留完全自理的老年样本。

###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老年生活质量。本文借鉴“健康老龄化=内在能力+环境支持”的概念框架,使用内在能力和环境支持两个维度测量老年生活质量。其中:内在能力是指个体在任何时候都能动用的全部身体机能和脑力的组合,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两个一级指标。身体健康主要使用自评身体健康。自评身体健康根据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分为很不健康至很健康5个等级。心理健康主要包括抑郁水平、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抑郁水平使用抑郁水平量表测量(8项消极表述和2项积极表述),得分越高表示越抑郁,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社会适应能力使用社会适应量表测量(4项消极表述和4项积极表述),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力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环境支持包括经济水平、外界支持和居住环境3项一级指标。经济水平用老年人社保待遇情况来衡量,选项为“①最低生活保障金、贫困救助金或政府其他救助;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④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分别赋值为1~4。外界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经济支持选用过去12个月该子女提供的财务价值,照料支持选用老人需要时家人、亲戚和朋友中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数,情感支持选用老人每月可以见面或联系的家人、亲戚和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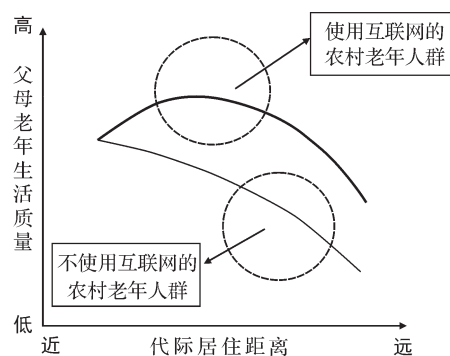


图1 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影响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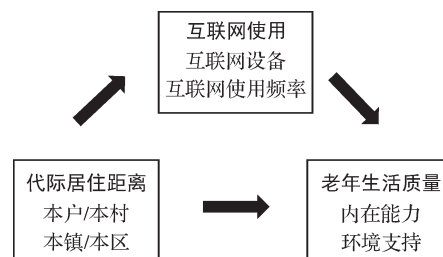


图2 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父母生活质量分析框架

友人数。居住环境包括居住条件和居住满意程度。居住条件选用室内洗浴设备、室内厕所和马桶这类设施情况来衡量。居住满意程度选用老人对村居整体情况的满意程度,问卷中分为道路情况、健身/活动场所、治安环境、环境卫生、尊老敬老氛围、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能力、道路/街道照明、无障碍设施8个方面,根据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五级量表计算整体得分。老年生活质量指标定义及测量见表1。

表1 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测量统计

N=3215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与定义	均值	无量纲标准差	权重/%
内在能力	身体状况	自评健康	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得分(1~5)	3.35	0.221	14.67
		心理健康	抑郁量表得分(9~27)	17.19	0.170	7.37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量表得分(8~40)	23.94	0.135	7.96
环境支持	经济水平	社保待遇评估	领取养老金等级(1~4)	1.69	0.208	19.32
		经济支持	子女经济支持程度(0~8)	2.75	0.207	8.71
	外界支持	照料支持	提供帮助人数(家人/亲戚/朋友)	5.55	0.199	7.26
		情感支持	见面联系人数(家人/亲戚/朋友)	6.47	0.221	6.86
	居住环境	居住条件	房屋是否包含浴室/厕所/马桶	1.03	0.357	20.08
		居住满意度	村社居住满意度得分(8~40)	17.59	0.240	7.77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老年生活质量指标测量经过以下3个步骤:第一,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正、负指标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Z_{ij} = (X_{ij} - \min X_{ij}) / (\max X_{ij} - \min X_{ij}) \quad (1)$$

第二,通过熵值法分别计算各维度指标权重。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能起到的作用越大。该方法测量的老年生活质量指标会放大两类样本生活质量的差异之处,便于比较分析。首先,计算第*i*个评价对象在第*j*个指标上的比重:

$$Y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quad (2)$$

其次,计算第*j*个评价指标的熵值:

$$e_j = -\frac{1}{\ln m} \sum_{i=1}^n Y_{ij} \ln(Y_{ij}), 0 \leq e_j \leq 1 \quad (3)$$

在此基础上定义差异系数:

$$g_j = 1 - e_j \quad (4)$$

$g_j$ 数值越大,越应该重视该指标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作用。最后,确定权重系数:

$$W_j = \frac{g_j}{\sum_{j=1}^m g_j}, j = 1, 2, \dots, m \quad (5)$$

第三,将各项评价指标的测量值进行加权平均,从而计算老年生活质量指数。整体来看,老年生活质量权重更偏重于环境支持。一方面由于环境支持各维度变量的确差异较大,赋权较高。另一方面空巢凄凉观点本质是居住距离过远使得环境支持可获得性减弱,加大环境支持权重更真实反映空巢对于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

(2)核心自变量:代际居住距离。指标的分类参考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将县域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其中,县域指的是县城所辖区域,包括县城及所属乡镇,因此县域设置为“本镇和本区”。将代际居住距离主要分成本户和本村、本镇和本区以及本市、本省外市、外省和境外,重点比较本户和本村、本镇和本区两类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研究表明,过远代际居住距离下的农村老年生活质量得分在各年龄段均偏低,

与以往空巢凄凉的观念一致。但是,本镇/本区和本户/本村样本的生活质量得分接近。同时,为了区别多子女家庭由于部分子女居住距离较远而导致的平均距离增加,当子女均不与老年父母同住时,选取问卷题目中老年父母“在照料上最为倚重的子女”作为居住距离的标准。

(3)中介变量: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互联网设备拥有情况,根据“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衡量,包括“是和否”两个选项。其二是互联网使用频率,包含“每天都上、每星期至少上一次、每月至少上一次、每年上几次、从不上网”5个选项,将每天都上网归为使用频率高,后4项归为使用频率低。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老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情况。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子女经济能力。由于老年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支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控制老年人生活的地区差异,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以及省级层面空巢率。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维度	变量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老年生活质量	由内在能力和环境支持指标加权	0.40	0.12
核心自变量	代际居住距离	本户和本村=0;本镇和本区=1	0.42	0.49
中介变量	互联网设备拥有情况	否=0;是=1	0.12	0.32
	互联网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低=0;使用频率高=1	0.05	0.21
个体特征	性别	女=0;男=1	0.55	0.50
	年龄	由被访者填写的出生年月算出	70.73	6.46
	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2;中学=3;大专及以上=4	1.83	0.72
家庭特征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0.70	0.46
	子女数量	没有=0;1个=1;2个=2;3个及以上=3	2.40	0.80
	子女经济能力	非常困难=1;困难=2;一般=3;宽裕=4;非常宽裕=5	3.14	0.62
地区特征	东部地区	否=0;是=1	0.22	0.42
	中部地区	否=0;是=1	0.44	0.50
	西部地区	否=0;是=1	0.34	0.47
	省级层面空巢率	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	0.66	0.12

### 3. 分析方法

第一,根据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主要采用工具变量(IV)的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两阶段法(2SLS)的模型设定如方程(6)和方程(7)所示,其中 $IV_i$ 表示工具变量。将第一阶段对代际居住距离的回归中获得的拟合值代入到第二阶段以获得对老年生活质量的估计。有效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以下两点:一是相关性,工具变量与代际居住距离相关;二是外生性,工具变量只能通过影响代际居住距离这一途径影响老年生活质量。通常认为在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变量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选择,例如Do等采用儿子个数、希望养老孩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sup>[36]</sup>。但是考虑到有研究认为子女个数和子女质量均可能影响到老年父母的生活质量<sup>[17]</sup>,本研究选取“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sup>[5]</sup>。

$$QOL_i = \alpha_0 + \alpha_1 IV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6)$$

$$Y_i = \beta_0 + \beta_1 QOL_i + \beta_2 X_i + \gamma_i \quad (7)$$

第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代际居住距离、互联网使用和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机制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其中,测量模型主要是检测观察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关系;结构模型主要是用以评估潜变量之间关系和影响潜变量的因素。

### 三、结果分析

#### 1. 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

首先,从内在能力、环境支持维度拟合了本户和本村、本镇和本区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得分曲线。图3综合指标拟合的曲线显示,本镇和本区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在中低年龄段中显著优于本户和本村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从内在能力上看,本镇和本区相比于本户和本村的老年群体,内在能力均值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换言之,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人相对同龄人内在能力更强。从环境支持上看,本镇和本区相比于本户和本村的老年群体,环境支持均值随着年龄增长先减少后增加,这源于年轻群体内在能力较强获得的主动环境支持较强,而高龄老年群体内在能力较弱获得的被动环境支持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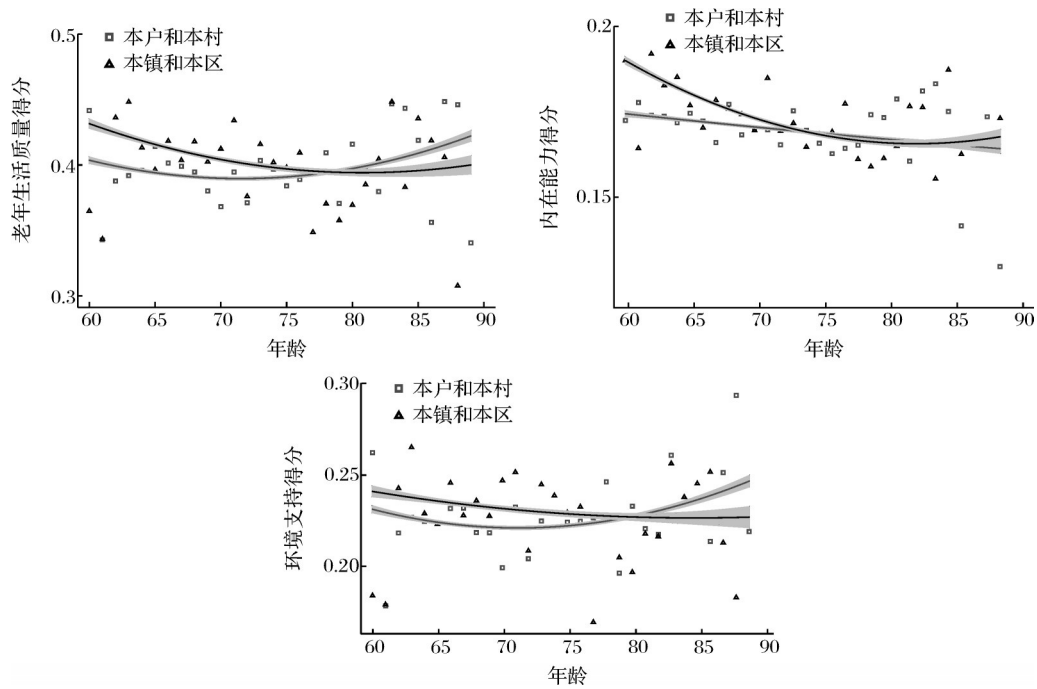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老年生活质量得分情况

其次,基于上述判断,本文回归分成中低龄老年组和高龄老年组两类。由表3可见,在中低龄老年组中(年龄小于80岁),代际居住距离均与内在能力、环境支持和老年生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子女在本镇和本区相比于子女在本村和本户,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高。经过样本差异性分析,高龄组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子女在县城发展时,高龄组老年人居住安排逐渐从与配偶同住转化为独居。高龄老年组独居率达到40.6%,而中低龄老年组独居率仅为16.2%。同时,在拟合老年人与配偶同住和独居的生活质量得分曲线后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与配偶同住将愈发影响老年生活质量。该结论建立在控制子女经济水平的基础之上,避免子女是因为经济水平低才与老年父母同住。综合上述分析,在当前的农村,子女代际居住距离延长到县域层面,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整体上更高。因此, $H_1$ 成立,但需要限定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样本。

#### 2. 内生性检验

模型的内生性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测量误差,即老年生活质量的测量误差与代际居住距离等因素存在着系统相关性。二是联立性,在居住模式对老年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内生性,主要是身体健康状况维度。因为居住模式的选择与老人本身健康状况息息相关,较差的健康水平使得代际居住距离更近以获得更好的照料支持。三是遗漏变量,导致估计出现偏误的遗漏变量是那些既与代际居住距离相关也与老年生活质量相关的变量。例如,可能是因为子女的经济水平能够在县城买房,使得老年生活质量较高。除此以外,问卷中有关老人隐疾、遗产馈赠等因素也

表3 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内在能力、环境支持和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

变量	内在能力		环境支持		老年生活质量	
	中低龄组	高龄组	中低龄组	高龄组	中低龄组	高龄组
<b>核心自变量</b>						
代际居住距离	0.003*** (0.001)	-0.001 (0.004)	0.011*** (0.004)	0.002 (0.010)	0.016**** (0.004)	0.002 (0.012)
<b>个体特征</b>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	0.003*** (0.001)	0.001 (0.004)	-0.007** (0.004)	-0.019** (0.010)	-0.003 (0.004)	-0.019 (0.013)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						
私塾或小学	-0.001 (0.002)	0.001 (0.004)	0.011*** (0.004)	0.020** (0.010)	0.013** (0.005)	0.033*** (0.013)
中学	0.008**** (0.002)	0.01* (0.007)	0.031**** (0.005)	0.067**** (0.017)	0.045**** (0.006)	0.088**** (0.020)
大专及以上	0.025** (0.012)	-0.976**** (0.275)	0.085*** (0.030)	0.156* (0.097)	0.109**** (0.035)	0.153* (0.108)
婚姻(参照组:无配偶)						
有配偶	0.007**** (0.002)	0.001** (0.036)	0.012*** (0.004)	0.016** (0.010)	0.019**** (0.005)	0.028** (0.012)
<b>家庭特征</b>						
子女数量(参照组:1个)						
2个	0.001 (0.002)	0.007 (0.008)	0.009 (0.006)	-0.056*** (0.021)	0.012* (0.007)	-0.059*** (0.026)
3个及以上	-0.001 (0.002)	-0.002 (0.007)	0.003 (0.006)	-0.055*** (0.018)	0.006 (0.007)	-0.066*** (0.021)
子女经济能力	0.008**** (0.001)	0.007*** (0.003)	0.016**** (0.003)	0.003* (0.008)	0.028**** (0.003)	0.014 (0.010)
<b>地区特征</b>						
东部(参照组:否)	0.016**** (0.002)	0.010** (0.005)	0.061**** (0.005)	0.048**** (0.013)	0.076**** (0.006)	0.054*** (0.016)
中部(参照组:否)	-0.001 (0.002)	0.002 (0.005)	0.010*** (0.005)	0.027** (0.012)	0.002 (0.005)	0.029** (0.014)
省级空巢率	-0.029*** (0.007)	-0.045*** (0.016)	-0.275*** (0.017)	-0.381*** (0.040)	-0.314*** (0.020)	-0.433*** (0.049)
N	2767	448	2767	448	2767	448
Pseudo R <sup>2</sup>	0.090	0.093	0.145	0.269	0.196	0.313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1%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无法被问卷观测。为了减少上述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如下:

第一,在老年父母正常老化<sup>①</sup>的情况下,代际居住距离往往和子女的职业、婚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sup>[37-38]</sup>。为了尽量控制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变量,控制变量分成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维度。其中重点控制了子女的经济水平,避免因为子女经济水平能够去县城买房,才导致老年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二,文献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老年自理能力存在内生性,即失能是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本文仅聚焦完全自理的老年人。

第三,采用工具变量(IV)的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第一个孩子性别通过了一系列工具变量检验。首先是具有相关性:第一个孩子性别和老年人代际居住距离在经验上存在相关性。第一个孩子是儿

① 连续性理论认为正常老化的积极结果是老年人使用连续性策略来适应正常老化,延续中年时期空巢居住安排。而病理性老化由于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而无法使用连续性策略,需要依靠子女做出相应的改变。



子时,大儿子有责任、也更有几率在本村成家。第二个及以后才生到儿子时,由于家庭中其他子女的帮衬,相对减轻了赡养责任。其次是外生性:第一个孩子性别与老年生活质量不存在相关性,出生性别的随机性以及样本的多子女性使得第一个孩子性别对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随机性。具体来看(表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发现:第一个孩子性别与代际居住距离在1%水平上呈负相关,这说明女儿有更高概率嫁至外村,而儿子有更高概率留在本村。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代际居住距离为本镇和本区的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仍然较高,  $H_1$  得到进一步验证。

### 3. 互联网使用对代际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机制分析

表5汇报了手机使用、上网频率对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第b列报告了代际居住距离对中介变量手机使用和上网频率的影响作用,其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代际居住距离会显著提高老年人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需求。第c列报告了在第a列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后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介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核心变量回归系数有所减小。因此,结果说明手机使用、上网频率等相关互联网使用变量是代际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

为了构建互联网使用等潜变量,加入结构模型分析。模型检验了农村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本文所选样本全部观测变量高低分组的  $t$  检验均显著,且由于样本数高达3215 (>1000),均值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样本数据适合SEM分析。结果可见,互联网使用、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均存在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是代际居住距离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部分中介变量。图4展示了模型中所有在1%水平上显著的路径及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当模型中存在中介效应时,因变量的影响路径以总效应、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来展示(表6)。总效应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影响系数,直接效应即不通过中介变量直接对因变量影响的部分,而间接效应则代表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sup>[39]</sup>。从总效应看,互联网使用、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影响均正向显著,即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生活质量存在正向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N=2767

变量	代际居住距离 IV-阶段I	老年生活质量 2SLS
代际居住距离		0.015**** (0.007)
第一个孩子性别	-0.595**** (0.082)	
$R^2$	0.058	0.1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F值	215.71	
Hausman 检验		13.11

表5 手机使用、上网频率对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

变量	a	b		c
	老年生活质量	手机使用	上网频率	老年生活质量
代际居住距离	0.015**** (0.007)	0.231** (0.111)	0.341** (0.166)	0.014*** (0.004)
手机使用				0.032**** (0.008)
上网频率				0.037***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96	0.044	0.040	0.108
N	2767	3135	3135	2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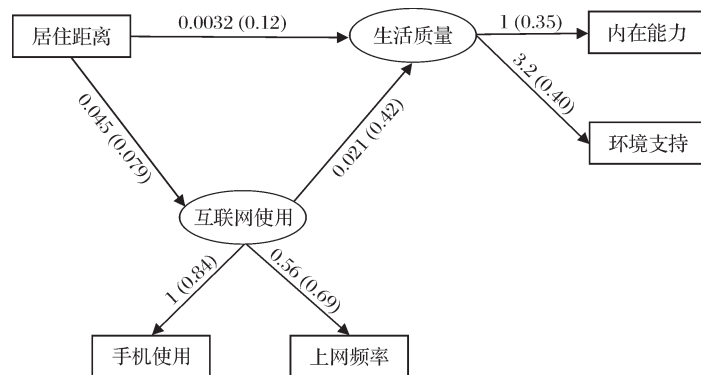


图4 互联网使用对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

显著影响,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也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看,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但间接效应相对较小(0.001),因此接受H<sub>2</sub>,即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的正向影响部分通过互联网使用实现。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 1.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本镇和本区以及本户和本村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县域是相对合适的代际居住距离,但局限于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群体。一方面,在中低龄老年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正向作用,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结论依然稳健。另一方面,从内在能力、环境支持维度拟合的本户和本村距离以及本镇和本区样本的老年生活质量结果显示,本镇和本区样本的中低龄老年人生活质量更优。

第二,互联网使用能够部分解释子女在县域居住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其在代际居住距离和老年生活质量间呈现部分中介效应。首先,代际居住距离的直接效应可以解释为,本镇和本区的代际居住距离既是代际矛盾和代际支持的平衡点,也是子女家庭事业和父母养老资源的平衡点。其次,间接效应表明,本镇和本区的代际居住距离有更大概率促使老年父母使用互联网,也因此获得更高生活质量。互联网使用的部分中介效应说明现代农村社会借助科技将有更多空间优势响应乡村振兴战略。

第三,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打破了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中国传统农村中,社会网络正如费孝通先生总结的差序格局一般,是一种受限地缘因素的扁平化格局。但是,互联网使用促使差序格局向脱离地缘因素的立体化格局发展。农村老年群体借助互联网联系亲朋好友,恢复或拓展社会联系,社会网络在立体投影下变得合乎差序格局的描述。

### 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吸引中青年群体到县域生活,破除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空巢刻板印象。一方面,乡村振兴县域发展政策的重点目标是吸引中青年群体定居并建设县域。地方政府要出台县域配套的安家落户优惠政策,激励年轻人到县城安家就业。同时,县域要优先吸纳本土年轻人才,推出相应岗位。另一方面,县域城市化带来的空巢现象是家庭居住安排的理性选择,这与空巢家庭的内在结构变迁和家庭功能延伸有关。宣传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将空巢和凄凉脱钩,倡导公众正视居住安排方式的多元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大比例的空巢家庭只存在统计意义,两代人仍然源源不断地相互汲取养分。同时,民政、卫健等部门在养老模式中应促进老年人自强观的建立和自身能力的发挥。公众亟需扭转对老年人尤其是中低龄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赡养者,而是家庭中的照料人,互助养老的供给主体<sup>[40]</sup>。

第二,赋能中壮年群体的家庭照料功能,协同照护高龄留守老人。一方面,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居住安排将有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或是接父母前往县域养老,或是返回农村尽孝。当地政府可以相应补贴通勤费用,方便接送高龄父母前往县域生活。此外,当地街道和居委会要帮助这类老年群体社区融合,丰富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方面,政策应对农村特殊空巢老年群体给予倾斜。统计部门要加强对老年空巢家庭内部结构差异的调研分析,更加精细化分类帮扶生活质量相对较低的空巢老人。在强化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健康保障的同时,民政部门需格外重视独居老人孤独感问题。

第三,继续推进乡村数字环境建设,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对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政

表6 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自变量	中介变量 互联网使用	因变量 老年生活质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代际居住距离	0.045***	0.004***	0.003***	0.001***
互联网使用	—	0.021***	0.021***	—

府可以利用互联网使用保障主动空巢家庭,推动形成“家庭—乡村—社会友好型”线下环境,构建有利于老年人“线上网络—线下乡村”相平衡的居家养老环境。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建设数字乡村,通过政府投入机制改革、利益分享机制改革、要素赋权机制建设等创新形式推动实现互联网乡村全覆盖。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网络平台继续优化“老年模式”,增强网络的线上包容性。同时,政府应借助老年广播节目和养老顾问岗位,通过专家和同辈传授等方式及时向老年群体宣传健康上网等基本知识。

## 参 考 文 献

- [1]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J].社会学研究,2016(5):189-214,245.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 周鹏.“差序格局”的消解——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地缘”伦理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22(2):13-19.
- [4] 胡湛,彭希哲.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134-155,202.
- [5] 余央央,陈杰.子女近邻而居,胜于同一屋檐?——居住安排与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健康[J].财经研究,2020(8):49-63,155.
- [6]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 [7]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社会学研究,2003(1):21-29.
- [8] 邓胜利,胡吉明.Web2.0环境下网络社群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90-95.
- [9] 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J].社会学研究,2021(6):45-67,227.
- [10] 姚远.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读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J].老龄科学研究,2020(1):13-17.
- [11] 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7(3):50-60.
- [12] 李建新,李嘉羽.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12(3):31-41.
- [13] 程翔宇.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6(1):31-37.
- [14] 邬沧萍.提高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科学认识[J].人口研究,2002(5):1-5.
- [15] 石智雷.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J].社会学研究,2015(5):189-215,246.
- [16]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主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1):121-136.
- [17] 王雪辉,沈凯俊.老年群体健康老龄化的多维评估及影响因素——WHO最新理论框架在中国的实证探索[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78-89.
- [18] WHO.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M]. Geneva: WHO, 1948:41-62.
- [19] WHO. 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M]. Geneva: WHO, 1986: 11-17.
- [20] BEARD J H, OFFICER A M, CASSELS A K. The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J]. The gerontologist, 2016, 56(S2): S163-S166.
- [21] 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中国人口科学,2002(5):61-71.
- [22] 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J].中国人口科学,2004(5):4-10,81.
- [23]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207.
- [24] 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1):107-132,206-207.
- [25] 张友琴.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5):112-118.
- [26] 石金群.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J].社会学研究,2016(6):191-213,245.
- [27] 张硕,陈功.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5(4):66-76.
- [28]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27-35.
- [29] HEO J, CHUN S, LEE S, et al. Internet use and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 18(5):268-272.
- [30] 靳永爱,赵梦晗.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9(6):44-55.
- [31] 孟伦.网络沟通对老年人家庭角色缺失的补偿[J].新闻界,2013(7):3-8.
- [32] 于潇,刘澍.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67-82,231-232.
- [33]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J].社会,2009(5):149-167.
- [34] 张文娟,李树苗.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8):34-39.
- [35] 郭瑜,张寅凯.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中国城镇养老新图景[J].社会学研究,2021(2):160-180,229.

- [36] DO Y K, MALHOTRA C. The effect of coresidence with an adult child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widowed women in South Korea: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67(3):384-391.
- [37] ATCHLEY R C. A continuity theory of normal aging[J].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9, 29(2):183-190.
- [38] MADDOX G L, DOUGLASS E B. Aging and variabilit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74, 29(5): 555-563.
- [39] 郑振华, 彭希哲. 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上海市不同生育状况“80后”家庭的比较研究[J]. *青年研究*, 2019(1): 63-75, 95-96.
- [40] 沈凯俊, 王雪辉, 彭希哲, 等. 准嵌入性养老组织的运行逻辑分析——农村嵌入式养老的地方经验[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1):148-166.

##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stance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Elderly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Based on Internet Use

SHEN Kaijun, YIN Siwei, SONG Liangjun

**Abstract** The rural family social network has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form limited by the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to the new form of “formal core and functional network”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Utilizing data from 2018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 this paper uses Healthy Aging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d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It compares the quality index with regard to different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s and uses SEM model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self-sufficient rural elderly and whose children live in the same town or district is equally satisfactory as the elderly whose children live in the same household or village. Second, internet use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which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voluntary empty-nest” phenomenon induced by internet use. Thir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have not only broken the spatial limitations of rural social networks and expanded the moderate living distances, but also responded to policies aimed at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through county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digital environ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intergenetational living distance; internet use; quality of life in old 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余婷婷)